

宁乡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宁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字数：107000 印数：1000

宁乡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3月

宁乡文史资料

第五辑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 少奇同志和我家的交往……………洪克宗 (1)
- 谢老“躲生”的故事……………吴岂凡 (8)
- 忆周小舟同志视察珍洲……………王国华 (11)
- 贺耀组轶事……………周千贞 (19)
- 陈家鼎传……………许 华 (31)
- 附《陈家鼎先生传记》…………… (38)
- 周渭舫事略……………蒋缙棠 (39)
- 成邦杰烈士传……………许抱凡 (42)
- 附 成邦杰诗联小辑……………李卫中 (44)
- 北伐将领王邦吉……………陶孟君 (47)
- 鲁涤平事略……………周德民 (51)

教 坛 撷 英

- 浏滨中学简介……………姜国芬 (58)
- 六十年前在第一师范的学习生活……………姜凤文 (67)
- 以延安精神办学
——解放初期梁 完小办学情况的回忆……………文祖仁 (73)

工 商 史 话

- 民生工厂始末……………孙凤琦 刘麟素 (81)
- “祝天芝”和“老三泰”……………黄祖同 (84)

胡大章棉布店简介.....黄祖同 (87)

民 俗 拾 趣

城关风俗琐谈.....孙凤琦 (89)

旧 政 遗 闻

田赋征实的种种弊端.....张季任 (97)

贪官柳梅林.....刘麟素 (101)

附 宁乡前田粮处长柳梅林案发入狱..... (103)

宁乡粮官 趁火打劫..... (104)

同 话 乡 关

忆黄材.....曾 焜 (105)

世外桃源话沔山.....曾 焜 (116)

灰汤忆旧.....黄香石 (122)

湖南花鼓在台湾.....唐友邦 (126)

百 年 史 迹

日本侵略军在宁乡的罪行.....王兴刚 (130)

宁乡百年大事记略.....文史办 (135)

1905—1906年在日本东京入盟的

同盟会宁乡籍会员.....胡菊桥 (154)

少奇同志和我家的交往

洪 克 宗

我的父亲洪赓飏和刘少奇同志是同乡，又是同岁。少奇同志生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比我父亲整整大一个月。他从十二岁起就在我家设立的私塾读书，与我伯父和父亲同学两年，之后又一同读高小，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两人没中断联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刘少奇同志由上海回湖南养病，被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逮捕。当时，我的父亲任湖南省禁烟局长（又名厘金局），也是政界中的一位有点名气的人物。他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格外震惊，因为知道共产党人被逮捕的严重性。于是，与各方面人士配合，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青年时代的好友少奇同志保释出狱。现在我把我祖母及母亲所谈及的有关情况缕述如下。

我的老家原在宁乡县芳储乡洪家大屋，是一个封建的旧家庭。从高祖起，高中举人、进士、翰林者多人，且历任清朝京官及地方官员。

我的祖父只二十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我的伯父洪迪光和我的父亲。伯母没生儿子，父亲就把三哥过

继给伯父做儿子，我是第四子。

我出生在长沙市。到了六岁时，住在老家（洪家大屋）的祖母要我下乡伴三哥读书，当时保国民学校就设在我家中。我和三哥放了学就坐在祖母那红漆饰金的富丽堂皇的宁波床的大踏板，听祖母讲故事，其中就听到了关于刘少奇同志青少年的一些情况。

祖母青年丧偶，她便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当我父亲六岁的时候，祖母即聘请了老师在家课读。

杨毓群老先生是当时家乡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他又名绍云，人们尊称为“绍云六公”。这位老师不但旧学根底很好，而且适应新潮流，读过一些翻译的外国经典名著，思想比较进步。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老师确实是很少见的。一些人听说洪家聘请杨老先生专教自家的两个孩子，便纷纷要求送子弟入学。祖母都一一婉言谢绝。惟有炭子冲刘家要求送少奇同志来读书，祖母却欣然同意了。祖母说：“我第一次看见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欢喜。他衣着朴素，很有礼貌，谈话不多，年纪不大，却显得很懂事；我看他一定会读书，将来必定大有出息……”。

少奇同志原名渭璜，家住炭子冲，距我家约十里。为了读书方便，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十二三岁的少奇同志就住在我家。他对杨老先生十分尊敬，读书又十分用功，深为杨老先生所器重。由于杨老先生的辛勤教导，三个学生的学习都进步很快。而且他们以后也都认为杨老先生的教育使他们得益非浅，常常怀念这位好老师。

少奇同志就读我家，祖母就要我父亲照刘家排列的顺序称少奇同志为九哥，要少奇同志称我父亲为庶弟，称我伯父为长哥。而他和父亲也确实如亲兄弟一样，每天谈论学习，

砥砺志行，食同桌，寝同床，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两年之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少奇同志与我父亲同时考入县城玉潭学校。玉潭小学毕业后，两人又一道去长沙升学。少奇同志考入长郡中学（因收费较少），我父亲考入明德中学（当时两所学校都是湖南省会有名的学校）。之后，少奇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在北京、保定等地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去了苏联。我父亲与他分别后，去日本东京进了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父亲在日本期间，两人还经常书信往返，没有中断联系。

一九二一年家父从日本回国，少奇同志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通过少奇同志的介绍，家父与我母亲结婚。母亲姓袁，名素，字荏苒，出生于宁乡一个书香之家。由于外祖父思想开明，她得以到长沙、上海求学，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师（与革命老人姜国仁同学，感情深厚，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及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母亲文学基础很好，擅诗文，长于音乐，婚前是位教师。她在上海与正投入革命洪流的少奇同志认识了，并且是经少奇同志介绍与我父亲认识和结婚的，婚后感情很好。父亲从日本回来，开始步入政途，不论工作、生活，母亲对他的帮助都很大。两人结婚六年，生我兄弟四人。一九二八年我父因生腰痛，不幸病逝长沙。那时我才两岁。随后不久，我那伯父也不幸逝世了。

二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少奇同志领导了上海大罢工。因积劳成疾，回湖南养病。十六日下午一时，少奇同志到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人，被扭往戒严司令部。赵恒

惕下令将少奇同志逮捕入狱。

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经第二天的长沙《大公报》登载后，全国各地工会、团体纷纷通电援救，通电多的一天达四十多份，刘少奇同志的亲友也纷纷营救。少奇同志被捕时，家父正在长沙任湖南省禁烟（鸦片烟）局局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马上设法营救。当时，家父还只二十七岁，风度翩翩，又是留洋归来，深为当道者所赏识，遂委以禁烟局长重任。省禁烟局先设洪江，后移长沙，专掌鸦片烟税收工作。为了押送税款，禁烟局还配备了武装。当时，大量鸦片从云、贵等省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是个总关卡，税收不少，尽是白花花的银元。禁烟局是一个很为人羡慕的机关，当权者及大小军阀无不眼睁睁地注视着这个机关，而这里的收入却又无不为当权者攫夺而去。正由于这样，所以家父和当时官场中的头面人物来往很多，关系密切。

赵恒惕统治湖南好几年，是督军，又是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握生杀予夺权柄。他下属的四个师长中，贺耀组、叶开鑫二人都是宁乡人，且叶的军饷大都由我父亲直接拨给，所以关系不同平常。另外，我的母亲因我父亲的关系也与赵恒惕、贺耀组、叶开鑫的眷属有所接触，尤其是叶的太太和我的母亲关系更为密切，如我母亲若有几天未去她家，她就要派人来接去。少奇同志被捕后，由于我父亲一再拜托叶、贺，我母亲又奔走于叶、贺、赵之间，早晚探听消息，一直奔忙了一个月，再加上党的营救和社会上各条渠道的协同努力，少奇同志才在我父亲等具结担保的情况下，于一九二六年元月十六日得以获释。

我父营救少奇同志的具体情况是父亲当年的随从周维宾（注）向少奇同志的哥哥刘作衡说的。为支持和接济少奇同

志读书、革命及保其出狱，洪家用钱是经常的。据周说，光保刘出狱那一次，就用了一千元左右。洪有一张乾隆皇帝的御笔字，价值六百块银元，为了保刘，这张字也送给叶开鑫了。父亲还在银楼订制了一套银餐具，叫周维宾送给了叶开鑫，请他力保少奇同志。周维宾还说，为营救刘，我父亲曾多次写信由他送到叶、贺的办公室或家里。同时，父亲还曾在长沙市天乐居、怡园酒家两次宴请湖南军政要人，请他们出面保释少奇出狱。少奇同志出狱后，到广州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受到广州各革命团体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父亲回国后担任的职务可说是阔差事，是在金钱里打滚。可是，他律己较严，去世时家中没有添一亩地，置一点产。他病危时握着我母亲的手流着泪说：“真对不起你，连你和孩子们的住所都没有留下……”，那时我们住的是佃了人家的一所房子。父亲死后几年，母亲就带着我和两个哥哥搬回乡下石塘冲居住。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就在抗战后不久，少奇同志从陕北延安对我祖母和母亲寄来了信和照片，表示了真诚可贵的关怀。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他在信中建议我们兄弟去延安学习。祖母因我们还小，只同意十七岁的大哥去。大哥单身离家，终因年小和途中多阻而无法到达延安。为了早日从戎杀敌，他就投考了当时的中央军校。之后，我二哥又考入了空军学校，一九四三年，当日寇大举进犯湖南，我初中毕业后也考入了军需学校。解放后，我又考入了中南军区军需学校。

土改后，我母亲孑然一身，又不能躬自耕种，就写了一

封信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来了信，大意是告诉我母亲可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不怕苦，可去北京学习。于是母亲去省文教厅联系，领了去北京的路费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经少奇同志批示，我母亲进了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五二年毕业前的一天，母亲正在上课，一位政治干部告诉母亲，有位中央负责同志要她去一下，车子已经到了外面，要她收拾书本马上去。原来是少奇同志派了汽车来接我母亲做客。这次，年过半百、白发盈头的母亲终于见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询问了我母亲的饮食起居，还亲切地垂询了我们兄弟的情况。当时，出抚给伯父的三哥虽在湖南大学毕业了，但抗战时曾被日寇打伤，遗留下间歇性的精神不正常症状，另两个哥哥均在解放前夕去台湾。说到这些，母亲隐隐流露些许悲伤。少奇同志便安慰她说，台湾一定会回归大陆的，分离不会长久无期。当天少奇同志还接待了一位老同学，这位老同学和我母亲一同被邀入席。席间，这位老人提出请少奇同志赠一张照片留作纪念。饭后，少奇同志欣然在两张六寸照片上签好名分送给他和我的母亲。少奇同志还问我母亲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母亲告诉他说就是眼睛不好了，缺少一副老光眼镜，看书写字有些困难。少奇同志当即从他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副他自己用的眼镜给我母亲。母亲试了一下，正好合用。

这天，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也会见了我的母亲。因当天王光美同志的母亲和她有约，所以她未吃午饭就和我母亲告别了。光美同志亲切而平易近人的神态，也给我母亲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母亲吃过午饭，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少奇同志又送我母亲上了汽车，离开了他家。这是解放后我母亲与少奇同志仅

有的一次会见。

一九七七年母亲身患肠癌逝于宁乡城，终年八十四岁。一九八〇年侨居国外的哥哥先后回国观光，并拜扫父母坟墓，看望洪家大屋，还专程去炭子冲瞻仰了少奇同志旧居。他们在拜谒了少奇同志旧居后，在外宾留言簿上写下了“您那富国强民的思想，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词句，表达了海外侨胞对少奇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

我家过去珍藏着的少奇同志青年时代及以后的照片、信件在“文革”中都一扫而光了，唯有这副眼镜，我母亲用了多年，后仍由我珍藏着。革命领袖的遗物，记下了它的主人为人民服务的辛劳！一九八七年，我把这眼镜献给了少奇同志纪念馆，作为我对这位从我们家乡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的深切怀念。

〔注〕周维宾先生解放前是煤炭商人，解放后公私合营入长沙市煤炭公司，已退休多年。现仍健在。住长沙市新开铺豹子岭南区区办板簧厂他的儿子周先碧处。

谢老“躲生”的故事

吴 岂 凡

一九六四年农历四月初三是谢老觉哉的八十生辰。我们亲属商议：谢老已年高望耄，自从参加革命很少回家，我们都有工作在身，也很少去亲近打点他老人家。这年八十生日，大家自费去京为他老祝寿，要我先写封信去征得同意，不然会要挨批评的。我于六三年除夕发去一封信。一个星期后，谢老给我发来亲笔复信如下：（此信原文交中央谢老文集办，我只存影印件）

“岂凡并告廉伯、子谷：

岂凡除夕信收到。

我今年、明年都要“躲生”。躲到哪里去？反正交通便利，准备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把生日过去。但决定不来长沙。

为甚么要躲？一、党中央早就规定，不准做生也没有人做过生。最近还批评某某下级为父母做生的事。二、人的生日，一年一度，是很寻常的事。三、不合增产节约的规定。四、老人们喜欢的是后一辈工作做得好，尤其是地方工作做得好，而不在乎甚么庆祝，岂凡如能写一篇很实际有意义的信给我，是最有价值的寿礼！祝你们好！

觉哉 一月二十五日”

全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谢老的党性原则，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放弃了去祝寿的念头，互勉努力工作，后代亲属也要好好继承和发扬谢老这种精神。我遵嘱写了一个《农村“社大”、“社代”与民主集中制》的实际调查材料寄去，回信认为是丰厚的寿礼，并充分肯定：上面派去的基层干部，与社员自己选出的人，在社员看来味道是两样。”后来他老在扬州过生，写来一信，并附《生日在扬州》七律一首：

“今年生日在扬州，十里扬州景物稠，
寺里琼花繁若锦，湖中西子瘦于秋*；
偶从僧舍观书画，又向同人问乐忧**，
八十年华如水逝，红旗招我再来游。”

我们从这些书信、诗词中得到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深刻改造。谢老的“生日观”也就使我们亲属后代长期继承和发扬下去：他的大儿子谢廉伯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去世，本着增产节约原则，顶住丧事大办的歪风，只开个追悼会就作安葬。二儿子谢子谷去冬满八十岁，有人劝他：“人生七十古来稀，你八十了，应该好好庆贺庆贺才是呀！”他爽朗地回答：“我家的人，都是‘躲生’没有做生的；要我做生，除非谢老复活批准！”结果，生日前几天就到在衡阳工作的儿子那里平常地过了生日。又，谢老的孙媳曾文义同志去冬满五十岁，亲戚们也劝她在家做寿酒，她坚决顶住这股歪风，生日先两天“躲”到未结婚的女儿的工作单位，也平凡地度过生日。适其女儿工作年评得了奖，她笑着对女儿说：“你工作得好，是给我最好的寿礼！”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人情风”包括“做生”在内，我今天把当年谢老给我的信及他老人家“躲生”的事实公开，对

于后来人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并从中得到教育、启迪，我想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原注：扬州平山堂有琼花两株，已百十年了，正值开花。琼花别地没有。扬州有瘦西湖，是名胜地。

※※原注：寺僧某善画，导观所藏画。乐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

忆周小舟同志视察珍洲

王 国 华

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天，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来到了珍洲，到了檀树山组食堂。下午，小舟同志步行到了五福桥彭家老屋组食堂，还到了我家及队办的猪场。从头至尾陪同他老的有当时大队总支书记石章贤同志和我以及小舟同志的秘书，副县长董华秀和公社干部廖达海也赶来陪同小舟同志到了彭家老屋组食堂。司机把小车停在檀树山后的车路边头。

檀树山组是总支书记石章贤的点，彭家老屋组是县委农办的点。一到檀树山，小舟同志就叫石章贤书记找几位老人来谈谈。不多久，石即将我的父亲王长枚等几个老信子找来了。一见面，小舟同志便亲昵不过地和我父亲拉起家常来。父亲出身上中农，在田里滚了一辈子，从没有大人物找他作过长谈，在这位省委书记面前，他先是感到局促，手足无措。小舟同志的一席家常话很快就消除了父亲情绪上的紧张，于是便毫无顾虑地与这位省委书记谈起自己一家在公社化前后的生活变化来。

小舟同志在默默地倾听我父亲的谈话：

“一九五五年，我加入了万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时有十五亩水田、二亩旱土、五亩山林，还有一头耕牛和全套农具，一家九口有三个主劳、四个半劳。当年年终决算，

全家共分得稻谷八千斤，进现金三百八十多元，加上养猪和其他副业收入共五百多元。全家生活是很不错的。

“一九五八年冬，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划类用粮，主劳每人每餐六两，半劳五两，老人、小孩四两、三两不等了（一斤为十六两）。全家一年实得口粮（谷）四千一百多斤，比在农业合作社时减少了三千八百多斤；主劳每月发钱五块，半劳四块，全年可得钱三百一十多元。同样也减少收入一百六十多元。同时，食堂一搞，家也散了，猪也不能喂了，一点副业收入也没有。唉，一寨人也搞得各散五方！……”

“这样一来，你们家一年收入减少一半多了呀！”小舟同志很有感慨地说，“这么办下去（指食堂），家里人不能生活在一起，病了不便照顾！”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一家人搬出了上百年的老屋，房子就没法管了，任凭它烂的烂，倒的倒，桁头、枋楼、檩木、门窗给食堂作柴火烧了，床铺、柜子等家俱也全“败”掉了，自己也作不了自己的主。父亲无限伤感地诉说了这些辛酸事。小舟同志最后似商量又似安慰地对父亲说：“农民不能没有自主权啊！”

时间快到十点了，小舟同志要石章贤邀几个队干、社员来座谈座谈。约莫过了半小时，队干廖达干、组长雷有明、社员雷满公等人，来到了书记身边，小舟同志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座谈会是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除了应邀的廖、雷等人外，董华秀、廖达海、石章贤和我都在座。小舟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都很少有拘束，被邀入座的队干、社员更是无所不谈，恨不得把心里话全都倒了出来。大家在接二连三地小舟同志发问：

“我们农民种了豆子送交粮站，一年到头就是吃不到豆腐呀！”

“红糖、白糖都买不到呀！”

“很多社员没有套鞋穿，打霜下雪出工只得打赤脚呀！”

“不少户子没有棉被盖呀！”

“小孩患‘疳积’，就是没有药买呀！”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该多关心一下我们农民的疾苦啊！”

“……”

小舟同志认真地倾听着社员意见，不时地点了点头，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作出回答：

“……你们作生产计划时可抽百分之十的田或者好土来种棉、麻吧！种了棉、麻，在年终分配时社员就可以分一点，就可以逐步解决衣被等问题。

“田边呀，空坪隙地呀，可利用种豆子，收了可分部分给社员打豆腐嘛”。

“每户可以划几厘自留地，可以种少量的蔬菜，可以喂一两头猪嘛。还可以向公路交通部门讲讲，在公路两边栽上榕树，长大了有收入，社里可用来打索子、做蓑衣罗。”

至于食糖和套鞋的供应问题，小舟同志也从供不应求方面向社员们作了耐心解释，并说回去以后要找有关部门联系，澄澄底子，尽量供应点套鞋、食糖。

当有章贤同志汇报到一年的生产规划和劳力安排设想时，小舟同志一再提醒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子不要打得太高。并且他还语重心长地劝诫我们队干，要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尤其要保护好妇女劳动力，不要损害她们的身心健康。他说：

“劳动力这么干下去不行，要搞劳逸结合。因劳累过度，生活艰苦，现在很多劳力病倒了，很多育龄妇女不怀孕了……这些事，我们都要关心呀！”

吃中饭了，食堂特为他老办了兩碗萝卜，里面也放了点瘦猪肉，还有一碗小鱼。小舟同志入席后，即忙从桌上端起一碗肉炒萝卜送给雷满公那桌。满公看看这眼前的省委书记，望望桌上的肉炒萝卜，激动而又愤懑地说：

“周书记呀——您，咯样看得起我们社员哟，要是我们这里的有些干部噢，打人骂人算他们的，在事务室里瞒着社员吃……也，也算他们的哟……”

饭后，我们跟随着小舟同志步行到了彭家老屋组食堂。时间快下午两点了，但食堂还在开餐。石章贤把作业组长彭于和叫了来，彭向小舟同志汇报了社员的生产生活情况。当彭谈到这个食堂开餐是每户“分类别用粮，按人口领菜，休息二十分钟开工，迟到五分钟扣工一分，迟到十分钟扣饭一餐”的“土政策”时，小舟同志严肃指出：“扣饭是不对的，要改掉呀！”

小舟同志又问到了这个食堂有多大，多少劳力抓生活。彭组长回答说：“食堂里长期种菜的有四个主劳，晴天还另安排男劳力挖土、妇女扯草，打米的一两个主劳，砍柴的四个半劳，煮饭、寻菜的四五个妇女，还有一个食堂会计。”

“啊呀，二三十个人为食堂生活服务哟”，小舟同志一听，有点吃惊了，“我建议，几十或百把人做一个食堂为好，一两个人就能办好食堂的生活。人少点生活必然好些，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高些哩。”

小舟同志随便走进了几户社员的家。首先到了杨瑞生的住房里。杨七十二岁，大孙女儿也有了十六七岁，除了儿